



求索中国

红色中国丛书

红旗出版社

文革前10年史

肖冬连 等著

下册





求索中国

——“文革”前十年

福建英湖社再夺高产冠军

花生亩产13241斤

人民日报
ENMIN RIBAO

1958年10月11日
第12版
（本报地址：北京前门大街2号）
（本报电话：25114）
（本报电报：25114）
（本报电挂：25114）
（本报发刊：1949年6月1日）
（本报创刊：1949年6月1日）
（本报宗旨：为人民服务）
（本报口号：光明日报）

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

早稻亩产13605斤
福建海星社创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斤纪录

人民日报
ENMIN RIBAO

雷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雷星
亩九分小麦亩产3530斤
北平福社十一亩亩产3215斤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红旗出版社

目 录

第七章	跌入谷底	(593)
7.1	危机潜行 饥馑已浸中国 继续跃进 狂飙再起神州	(593)
7.2	再衰三竭 中央首议调整 十年总结 领袖初感迷茫	(619)
7.3	克服动摇 毛泽东反修担大任 撤退专家 尼基塔制华施强压	(639)
7.4	“兄弟”闯关 邓小平舌战莫城 共御其敌 刘少奇勉求和局	(657)
7.5	应时而出 林彪大搞政治 厄运难逃 谭政不跟高调	(672)
7.6	群情激愤 苦保钢铁跃进 灾情弥漫 力挽农村危局	(686)
第八章	体察民愿	(708)
8.1	天道难违 大跃进嘎然止步 真情苦塞 毛泽东高倡调研	(708)
8.2	常委下乡 亲察民情感愧疚 百姓翘首 但求温饱盼松绑	(732)
8.3	聚首北京 再议农村体制 又上庐山 组织城市调整	(752)

8.4	核算下放	人民公社尘埃落定	
	包产到户	百姓要求再退一步	(775)
第九章 走出困境			(794)
9.1	总结经验	七千人聚会京城	
	放开言路	众常委坦言得失	(794)
9.2	少奇主政	疾呼“非常时期”	
	陈云受命	力主“伤筋动骨”	(831)
9.3	为民代言	舆论吁请包产到户	
	顺应民意	常委引为度荒之计	(851)
9.4	甄别平反	总书记主张一风吹	
	申屈辩诬	老元帅再上万言书	(874)
9.5	调整政策	文化领域骤雨初歇	
	脱帽加冕	知识分子又遇早春	(895)
9.6	内紧外松	中苏论战忍而未发	
	困局当前	部长进献缓和之策	(915)
第十章 风向突变			(934)
10.1	游历山川	毛泽东静观内外形势	
	扭转方向	北戴河重提阶级斗争	(934)
10.2	相互激怒	共运战烽烟再起	
	豪情勃发	毛泽东准备反攻	(961)
10.3	两党会谈	中苏破裂覆水难收	
	全面反攻	反修大战势如破竹	(979)
10.4	挖掉修根	毛泽东发动四清五反	
	减少冲击	周恩来勉力继续调整	(993)
第十一章 反修迷误			(1019)

11.1	论战升级	毛泽东意在壮大队伍	
	赫氏下台	周恩来赴苏谋和未果 (1019)
11.2	主席紧弦	警惕中央出赫鲁晓夫	
	少奇挂帅	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1042)
11.3	两个批示	知识界又遇厄运	
	文化批判	大动乱初露端倪 (1073)
11.4	“一线二线”	毛刘之间分歧显露	
	“大权旁落”	主席暗下倒刘决心 (1098)
第十二章 风满危楼		 (1116)
12.1	重上井冈	主席运筹二次“革命”	
	二下上海	江青拉开“文革”序幕 (1116)
12.2	叶群告状	毛泽东听信一面之词	
	林彪发难	罗瑞卿遭受突然袭击 (1134)
12.3	节制运动	彭真主持制定《汇报提纲》	
	发动攻势	江青秘密炮制《座谈纪要》 (1148)
12.4	令牌连发	统帅坐镇杭州遥指北京	
	狂飙迭起	文革序幕结束正剧开场 (1168)
结束语 从历史寻找智慧		 (1190)
参考书目		 (1212)
后 记		 (1217)

第七章 跌入谷底

7.1 危机潜行 饥馑已浸中国 继续跃进 狂飙再起神州

饥馑已逼近中国老百姓

1959年底，几名休探亲假的警卫战士，奉命调查和汇报农村实情。他们带回来农民吃的糠菜窝头。一路上窝头已经捂馊，交到毛泽东手中时，毛泽东受到震动。他用颤抖的手掰开窝头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吃，这是农民的口粮，我们每个人都要吃……”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

我分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嚼啊嚼，就是咽不下去。这窝头与河南吃的烤面包真是天地之差。

我想起了马维带来的那个窝头，想起了毛泽东讲的“要想个办法”……

毛泽东独自拿了一个整窝头，咬第一口，他眼圈红

了，喉结上下抽动着，有些壅塞。咬第二口，泪花沾湿了睫毛。咬第三口，泪水已经哗哗地淌下来。

他哭了。无声的哭是最沉痛的哭。我相信，他想到的决不止是农民受了苦，他一定还想到了河南吃的烤面包，在铁路旁的村子里吃的红烧肉，想到了一个领导者的责任，想到了他的美好理想与严酷的现实……

李银桥说的马维从家乡带来的那个使毛泽东落泪的窝头，是在1957年秋。两年过去了，老百姓吃的仍然是无法下咽的窝头。毛泽东再次心事沉重，潸然落泪。

不过，毛泽东还不知道，这时老百姓受的苦与1957年不可同日而语。他更难相信，这正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尤其是庐山会议后全党反右倾带来的严重后果。充其量，他认为这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困难。在这种形势下，气可鼓不可泄，只要动员全国人民忍受暂时的困难，鼓足干劲继续“大跃进”，就能摆脱困境。战争年代，多少困境不都是这样挺过去了吗？

毛泽东说：

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增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他的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1959年12月至1960年1月读书笔记）

刘少奇也说：

农民说得好：“几年辛苦，万年幸福。”

如果群众觉悟提高，群众会说：宁愿少吃一点，多积累，多生产一些。那么速度就快了。积累多少？只要群众谅解，可以多积累。（1959年11月13日讲话）

暂且不说“几年辛苦，万年幸福”的口号是否代表了农民的心声，那个年代什么口号都会制造出来。问题是这时，在许多农村，“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这两条都保不住了，不是“少吃”，而是“没吃”。情况比领导人想象的严重得多。1959年～1960年冬春，饥馑已经逼近中国的老百姓。

顾准日记：一个落难思想者的实录

从留下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很难了解当时发生在农村的灾情。从各省市报来的情况，从天天的《人民日报》上看到的消息，形势一片大好。

幸亏，我们有《顾准日记》。

顾准，一个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原是学部经济所的经济学家。1959年10月至1960年1月下放河南商城监督劳动。在这里，他时断时续地写下了一本“商城日记”^①。他本来是不让别人看的。在当时，如果真的示之于人，那于作者，只能是“罪上加罪”。正因为不打算示人，也就去掉了粉饰、矫情、造假的苦恼，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实录。

^① 《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

右派下放监督劳动，本来着重于思想改造，然而，这时，顾准首先接受的是饥饿的洗礼。正因为这样，顾准花了不少笔墨来记自己如何想办法搞东西吃。一条胡萝卜，成了“宝中之宝”。有几次他吃饱了，就高兴得大写“痛快之至”。其实那个时候，不少人都已到了生物本能的极限，按照生物本能活着。

在冀鲁豫时不能下咽的，这回全部吃完。尤其晚饭三百斤菜，七十五斤米的菜饭，加一盆红薯叶，居然吃完。饥饿是可怕的。（1959年11月21日）

为食物的欲念所苦，想如何找杨陆何三人中的好对象得以早上喝一次菜汤。想如何搞一点红薯与胡萝卜吃。（1959年12月15日）

劳动队的肿病一下子在一个月內从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1959年12月17日）

为了果腹，他也去偷吃萝卜，他自问：“我是否变得卑鄙了？我偷吃东西，我偷东西吃，我不如青年人有献身精神等等？不，没有。如法捷耶夫描写两个人在远东森林里打游击一样，我以后也要如实描写自己。”（1960年1月16日）

劳动队虽然艰苦，但跟农村人民公社比起来，“劳动队还是天堂”，（1959年12月27日）顾准日记中不时出现农村灾民的形象和饿死人的消息。

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刘引芝的父亲死了。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缝纫室的哥嫂同时死亡，也是肿病。1959年旱灾，1960年春

夏，说还有多少人死亡呢？（1959年11月4日）

劳动队真是天堂。徐从周的孩子在这里吃了晚早二顿稀饭，欢喜得不得了。徐从周是在避难所里。我对他说，现若他仍在农村，目击心伤，如何过去？（1959年11月4日）

刨红薯，民工过路，歆慕不已，都到地头捡残屑，驱之不去。一个新发明，红薯藤磨粉。（1959年11月13日）

死人已知柳学冠之弟、杨文华之女、刘文惠之父。其他所听说的还不少。（1959年11月27日）

附近路倒尸二起。黄渤家中……十五人中死了五个。（1959年12月17日）

柳学冠家母弟同时死了，杨柔远母亲死了。夏伯卿家死了人，张保修家死了人。（1959年11月30日）

“饥饿——浮肿——死亡”的规律无法逃遁。饥馑正在农村肆虐。

《顾准日记》记录的实情，与决策者的估计，与公开的宣传，差距何其大也！假如最高层了解真情，会作何处置？假如不堵塞言路，路人皆知的灾情，能不上达吗？

毛泽东再次倡导全党读书

这时，毛泽东又向全党高级干部发出倡导读书，指定的书目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9年1月第三版）。

早在1958年冬，毛泽东就倡导读书。当时“大跃进”和人民

公社化运动正如火如荼，毛泽东在为“九个指头”的成就而欣喜的同时，也发现了属于“一个指头”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多次倡导读书，希望通过读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1959年6月初上庐山时，毛泽东最初拟定的议程，第一项任务就是读书，他说：“不要整年整月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后来，形势突变，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毛泽东号召读书的事也就被搁置一边了。

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庐山会议后全党反右倾。为了回答国内外的怀疑，也为了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一套做法寻求理论上的支持，毛泽东再次倡导读书。

当时，中国和苏联在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已经出现明显的分歧，为什么毛泽东还要求全党读这本书呢？他曾经这样回答：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在理论上成系统的东西还不多，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外，只有这本书。他说：这本书“缺点有，但比较完整”。1960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建议：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读政治经济学的小组，先读这本书的下半部，五一节以后读上半部，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他说：“你不读，我们也不了解苏联，不了解他讲些什么事情，同时我们要写教科书，也没有比较。”

毛泽东本人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广州三地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批“秀才”。

在这之前，1959年11月2日至22日，已有刘少奇在海南崖

县（今三亚）组织了读书小组。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以及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书记林学明等参加读书小组。在这之后，周恩来于1960年2月13日至3月2日在广东从化组织了自己的读书会。参加的人员有李富春、陶铸、宋任穷、吴芝圃、胡绳、许涤新、薛暮桥、王鹤寿、吕正操、陈正人等人。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边读边议，议论风生，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审视苏联教科书，发表了许多意见。参加读书的同志将这些谈话，整理成笔记，保存下来两种本子：一种是把毛泽东的谈话按问题归纳，加上小标题，一共列出13个问题。冠名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一种是按章节顺序，记录了毛泽东的谈话，标题为《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这两份笔记为今天的人们记录下了当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思想脉络。

毛泽东在这时，花上3个月时间坐下来读书，可见他对探寻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急切愿望，其中不乏有见地的思想。然而，这时，他的主导倾向是要维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这三件东西毛泽东视为至宝。但在国内外都遇到了非难，国内有“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进攻”，国外有赫鲁晓夫的指责、杜勒斯的讥讽、尼赫鲁的乘人之难。毛泽东发誓，这三个东西，要向全世界宣战：他要用实践来回击国内外的挑战。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分歧的加深，也使毛泽东更多地着眼于“批判”而不是借鉴，急于写出自己的教科书。批判的武器是中国的经验。当时，中国只有10年的建设经验，前7年基本上是搬苏联，谈不上独创。1956年的认识和八大路线，毛泽东自己已经不重视。剩下来的只有3年大跃进的一套做法。今天来阅读毛泽东的读书笔记，仍然强烈地感受到他对1958年以来的路线的自信和

维护。读书并没有如毛泽东自己所说：“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

“我们就要这样干：‘开足马力奋勇前进’”

中国能不能大跃进？大跃进能不能持续下去？

毛泽东的回答是：能！他说：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

法国《快报》评论中说：“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我们因为穷，人口那么多，东西那么少，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有现在的这样一种干劲，这样一种朝气，而且一定要长久保持下去。

中国现在还处在被人看不起的地位，这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还不行。这对我们有好处，逼着我们努力，逼着我们进步。

对我们1959年新闻公报，《纽约时报》的评论说：中国比苏联优越的地方有四条：一、中国可以得到社会主

义国家的帮助，苏联那时没有这种帮助，它当时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二、中国的合作化搞得快，没有造成损失；三、中国的劳动力多，而且用人民公社这种“集中营”的方法组织起来了，拿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多，而且在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下高度地组织起来了；四、中国是落后的国家，可以接受最先进、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这是一切落后国家赶上先进国家的优越条件。这个评论比较客观，看起来同我们的想法差不多。我们的任务是经过一、二十年几十年的努力，在主要产品产量方面首先超过英国，然后超过美国。

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办法很有意义。这是政治鼓舞，不是物质刺激。我们提出赶英国，第一步按主要产品产量来赶，下一步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来赶。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我们还比他们落后得很远，我们一定要争取赶上他们。日本这样小的国家，都有四百万吨商船，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强大的船队怎么能行。

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拿汽车来说，我们这样的大国，最少应该有三、四个像长春汽车厂那样的制造厂。

这里，毛泽东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找到了可以“大跃进”的根据，他对于国外评论“穷是中国跃进的动机”这句话尤其欣赏。对于外论中把人民公社组织形式比之为“集中营”并无愠色，反而称“这个评论比较客观”。他急切地希望中国“进步”，改变“被人看不起的地位。”他说：“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干：‘开

足马力奋勇前进’”。他预言：“经过 58~59 年大跃进，60 年将是生产大发展的一年。”

这时，全党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继续“大跃进”的“气”早已鼓起。各地的报告，“形势喜人”。有的人甚至认为，如果早反右倾，困难就不会出现。《人民日报》浮夸虚幻之声不绝于耳。每天都有醒目的标题：“形势无限好，高潮日日高”、“实现大跃进”、“大办工业”、“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食堂”、“大搞副业”、“大搞深翻”、“大办文教卫生”、“高速万岁”。接近岁末，又见丰收喜讯纷呈：欢呼《奇迹！奇迹！》。

毛泽东接过卫士从农村带来的馊窝头时的抑郁心情，已烟消云散，他又为全国的跃进形势而精神亢奋。

中共中央已经提出 1960 年经济建设总方针：“在 1958 年和 1959 年连续跃进的基础上，要争取 1960 年国民经济继续跃进。”

1960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望 60 年代》，宣布已经实现了提前 3 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号召。说：“我们不但对于 1960 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信心，而且对整个 60 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信心。”

1 月 2 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单看标题，就已感到了“大跃进”的热浪袭人。

1 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1 月 9 日，毛泽东再次向与会者发问：“资产阶级都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他说：“现在，有些人不相信我们（的大跃进），是有理由的。你没有东西，他怎么能够相信呢？”“经过若干年，我们真正有了东西，而且经过多次反复，他们才会相信我们。”

1 月 23 日，毛泽东又将一个文件批给其他领导人，他重重地

批道：“看来，连续大跃进是可能的。”

上海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产钢1840万吨，产粮6000亿斤。会上还讨论了二五计划后3年设想和未来8年的初步设想。

3年设想是，提前5年实现赶上英国的口号，提前5年实现12年农业发展纲要，提前5年实现12年科学规划。

8年总要求是：以共产主义的雄心大志，尽可能地加快建设，保证工农业生产不断跃进，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经济体系。同时，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分配制度中要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因素。

这个3年、8年设想体现的，依然是要尽可能地赶上和超过美国，早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领导人脑子里，充满着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的思想。

上海会议后，各地再次掀起“大跃进”高潮，各种“大办”，一轰而起。3~4月召开的二届二次人大会议通过了1960年的“大跃进”计划。

周恩来对这种势头心有疑虑。年初，他在从化读书时委婉地提出：“今年又有‘左’的苗头”。“总不能天天跃进，总有波浪。”然而，在“大跃进”热浪再度席卷而来之时，周恩来的这种声音显得多么微弱。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准备条件过渡”

从1958年起，“大跃进”总是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大跃进”速度放慢些，过渡的安排也推后一些；“大跃进”再度强调时，过渡问题重又成为当务之急。

庐山会议后，全党再次发动“大跃进”，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自然成了毛泽东乃至全党关注的焦点之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读书笔记都以很大篇幅，饶有兴趣地谈到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不同阶段，应当有两个过渡。毛泽东进而认为，社会主义阶段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然后再在物质产品、精神财富和人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基础上进入共产主义，他又认为，在这两个阶段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所有制逐步发展的问题，即先由目前的基本队所有制发展到基本社所有制，再由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发展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此后，就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

毛泽东、刘少奇关于两个阶段的观点和多次过渡的观点，是一个有意义的思考，它对于径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想法，客观上起到一定节制作用。阶段多了，时间也就自然延长了。

然而，毛泽东接下来又提出：当前面临的，是如何与继续“大跃进”相适应，来实现由基本队所有制向基本社所有制的过渡。又把过渡问题提到议事日程。

毛泽东对苏联教科书中关于“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提法特别反感。他说：“彻底巩固”四个字看了不舒服。社会主义制度要巩固，但不能强调过分，“任何东西都不能看成永恒的。两种所有制的并存，不能是永恒的。”刘少奇也说：“‘大力巩固’集体所有制的提法也是有问题的。”

毛泽东对列宁的一段经典论断“国家愈落后，过渡愈困难”，表示异议。他说：“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对，其实经济越落后，从